



FOCUS

高层动态

2021年9月13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63.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本期目录

| | |
|----------------------------------|----|
| 最新动向 | 3 |
|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 3 |
| 【李克强：坚持睦邻友好 推动次区域发展繁荣】..... | 4 |
| 【李克强：支持地方深化改革先行先试，更大力度利企便民】..... | 6 |
| 【栗战书：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突出位置】..... | 7 |
| 【汪洋：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 7 |
| 【韩正：中国政府将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 | 8 |
| 【孙春兰：弘扬尊师重教传统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 8 |
| 【胡春华：积极主动做好新形势下的外资工作】..... | 9 |
| 问题探析 | 10 |
| 【中国要为全球碳定价市场做足准备】..... | 10 |
| 【权利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 11 |
| 【养老金改革是应对储蓄率下行的重要抓手】..... | 13 |
| 人物关注 | 16 |
| 【王莉霞当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 16 |
| 智囊高参 | 17 |
| 【黄群慧：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 17 |
| 【黄益平：中国保持对外开放、融合的态度不会变】..... | 20 |
| 虎视寰球 | 23 |
| 【国际粮价为何高烧不退】..... | 23 |
| 【英国增税 360 亿英镑惹众怒】..... | 25 |
| 【我国与东盟贸易发生巨大变化】..... | 27 |
| 华夏透视 | 28 |
| 【城乡关系变迁、工业扶贫变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构建】..... | 28 |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9月9日晚以视频方式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晤。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15周年。15年来，五国坚持开放包容、平等相待，增进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断探索正确的国与国相处之道；坚持务实创新、合作共赢，对接发展政策，发挥互补优势，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坚持公平正义、立己达人，支持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国际舞台上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今年以来，五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金砖合作保持发展势头，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新进展。事实证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金砖合作就能走稳走实走远。

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金砖合作 应对共同挑战》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际秩序演变深刻复杂。面对挑战，金砖国家要展现担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推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我们要推动全球团结抗疫，携手应对疫情，坚持科学溯源，反对政治化、污名化，加强联防联控，促进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研发、生产、公平分配。

——我们要推动开放创新增长，助力世界经济平稳复苏，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让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惠及所有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我们要推动共同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我们要坚定信念、加强团结，推动金砖务实合作朝着更高质量方向前进。习近平提出5点倡议。

第一，坚持同舟共济，加强公共卫生合作。要拿出应有的政治担当，支持彼此抗疫努力，分享疫情信息，交流抗疫经验。要在疫苗联合研发、合作生产、标



准互认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推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在线上尽快启动。要加强传统医药合作，为抗击疫情提供更多手段。

第二，坚持公平可及，加强疫苗国际合作。中方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和相应技术支持，为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加强全球抗疫合作作出积极贡献。截至目前，中方已向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10 亿剂疫苗和原液，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 20 亿剂疫苗。我愿宣布，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美元基础上，年内中国将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 1 亿剂疫苗。

第三，坚持互利共赢，加强经济合作。要落实好《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 2025》，拓展贸易和投资、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中方倡议举办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大数据论坛。欢迎新开发银行扩员取得实质进展，期待银行在支持成员发展和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厦门创新基地已经正式启用，欢迎金砖国家政府有关部门和工商界积极参与。

第四，坚持公平正义，加强政治安全合作。要巩固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用好外长会晤、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等机制，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立场协调，发出更多金砖声音。

第五，坚持互学互鉴，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中方倡议建立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举办职业技能大赛。中方还将举行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和人文交流论坛，开设五国媒体线上培训班。明年年初，中国将主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期待金砖国家等世界各国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取得佳绩。

习近平强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我们在推进金砖合作的道路上，要顺应时代变化，做到与时俱进。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金砖机制一定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习近平指出，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中方期待同金砖伙伴一道，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构建更紧密、更务实的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开创美好未来。

五国领导人围绕“金砖 15 周年：开展金砖合作，促进延续、巩固与共识”主题深入交流，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新德里宣言》。

五国领导人充分肯定金砖合作 15 年来取得的成就，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复杂国际形势，五国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富成果，提升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地位，愿继续共同努力，深化金砖战略伙伴关系，推动金砖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五国领导人表示，将继续推动全球团结抗疫，反对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愿加强公共卫生和疫苗合作，推动疫苗公平可及，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复苏，努力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各方重申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主张各国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平等，将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合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据新华社）

[Top](#)

【李克强：坚持睦邻友好 推动次区域发展繁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9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七次领导人会议并发表讲话。柬埔寨首相洪森主持会议，老挝政府总理潘坎、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泰国总理巴育、越南总理范明政和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浅川雅嗣出席。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

李克强在讲话中表示，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是近邻中的近邻，亲如一家人。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成立以来，惠及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地区稳定和繁荣提供助力。

李克强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起伏反复，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次区域各国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增长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应凝聚共识，增强政治互信，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共同推动次区域的可持续和包容发展。李克强就此提出六点建议：

一是深化水资源合作，造福沿岸各国。充分尊重各国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正当权益，有事大家商量着办。中方从去年起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向湄公河五国提供澜沧江全年水文信息，率先开通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网站，愿共同办好第二届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和合作论坛，加强上下游团结合作，提升流域综合治理和水资源管理能力。

二是坚持生命至上，携手做好疫情防控。弘扬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和疫苗合作。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优先向湄公河国家提供疫苗等医疗物资援助，愿利用已设立的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开展疫情监测、传染病防控合作。

三是加强贸易投资，共促经济复苏。加速核准并尽快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实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为包括次区域国家在内的各国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四是推进互联互通，实现协同发展。落实《2030 交通战略》，充分发挥中老铁路即将通车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建设中泰铁路、金边—西哈努克港高速公路等重大项目，积极推进区域电力协调中心建设。

五是促进可持续发展，持续改善民生。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合作，实施好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第三期项目。积极探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旅游合作新模式。

六是巩固政治互信，维护次区域国家共同利益。始终坚持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顾彼此重大关切。始终秉持多边主义，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倡导开放包容理念，发挥各自优势，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澜沧江—湄公河等机制协调发展。

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将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着力办好自己的事。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精准性、有效性，做好跨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促进公平竞争，积极推进开放、包容合作。中国的发展将给包括湄公河国家在内的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创造新的发展红利。

李克强最后强调，中方愿同湄公河国家一道，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次区域融合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新的贡献。与会各国领导人和有关机构负责人赞赏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建议，感谢中方为各国抗疫提供的帮助，表示面对疫情冲击和国际地区形势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应坚持多边主义，化挑战为机遇，推动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强劲复苏，实现可持续、



包容发展，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会议发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七次领导人会议宣言》，通过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2030 战略框架》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复苏计划（2021—2023）》等成果文件。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据新华社）

[Top](#)

【李克强：支持地方深化改革先行先试，更大力度利企便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部分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支持地方深化改革先行先试、更大力度利企便民；通过《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草案）》。

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稳定市场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会议决定，在实施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推动在全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同时，选择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 6 个市场主体数量较多的城市，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关切，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一是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推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取消对企业跨区域经营不合理限制。破除政府采购等领域对外地企业的隐性壁垒。推进 7 类客货运输电子证照跨区域互认与核验。二是进一步方便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在发放实体证照同时，同步发放电子营业执照等，便利企业网上办事。精简银行开户程序，压缩开户时间。推进市场监管、社保、税务等年报“多报合一”。探索适应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准入准营标准。破产案件受理后，允许破产管理人依法查询有关机构掌握的破产企业信息，在处置被查封财产时无需办理解封手续。三是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在土地供应前由政府部门开展地质灾害、水土保持等一揽子评估，强化责任。企业拿地后即可开工，不搞重复论证。对水电气暖等市政接入工程施工许可，实施告知承诺管理和在线并联办理。四是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推动与部分重要贸易伙伴口岸间相关单证联网核查。简化港澳投资者商事登记手续。支持开展国际航行船舶保税加油业务。五是创新和完善监管。在食品、药品、疫苗、安全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领域，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健全遏制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长效机制。纠正中介机构垄断经营、强制服务等行为，清理取消企业在资质资格获取、招投标、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差别化待遇，维护公平竞争。六是优化涉企服务。建立因政策变化、规划调整等造成企业合法利益受损的补偿救济机制。完善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加快打破信息孤岛，扩大部门和地方间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范围，推动解决市场主体反复多处提交材料问题，促进更多事项网上办、一次办。

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监管效能，更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会议通过《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草案）》。草案与证券法等有关规定相衔接，对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采取纠正涉嫌违法行为、赔偿投资者损失等的措施作出规定，对不履行承诺的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维护市场秩序，及时依法依规对投资者损失予以合理补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据新华社）

[Top](#)



【栗战书：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突出位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9月7日在第五次世界议长大会发表视频致辞。栗战书在视频致辞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反复，各类全球及地区问题此起彼伏，各国人民对生命安全的渴望日益迫切，对和平发展的呼声日益强烈。一年多来，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得出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抗疫既要靠团结，也要靠科学。栗战书强调，我们要坚持生命至上原则，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突出位置，尽快控制疫情蔓延。要积极推动在疫苗生产分配、疫情防控、关键物资、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提高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在与自然病毒作斗争的同时，也要与政治病毒作斗争，坚决反对把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将病毒溯源等问题政治化的做法。

栗战书说，各国命运休戚与共，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我们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以政治、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热点问题，要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栗战书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继续同各国议会联盟和各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议长大会由各国议会联盟主办，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议会界盛会。第五次世界议长大会的主题为“发挥议会领导力，强化多边主义，为世界和人民带来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据新华社）

[Top](#)

【汪洋：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十三届全国政协第54次双周协商座谈会9月10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确认识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发展进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持续推进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同心协力打赢碧水保卫战，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言出力。

11位委员和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角度建言咨政。60多位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上发表意见。大家认为，我国城镇污水处理事业起步晚、发展快，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污水处理设施短板加快补齐，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成效明显，有力支撑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同时还存在管网建设投入不足、政策标准不协同、污水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行与设备闲置并存等问题，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依然任重道远。

委员们建议，要摸清污水管网底数，全面排查渗漏、腐蚀、开裂、沉降等病害，消除隐患、填补空白、补齐短板。要科学制定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做到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主体功能区、水环境容量、再生水潜在用途等相匹配，克服盲目提标的倾向。要坚持因城施策，合理选择雨污分流、合流等排水系统，科学确定管网设施改造方案，有序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防止一哄而上。要积极推进污水污泥资源化利用，鼓励地方开展再生水利用、回灌地下水等试点示范，向污染源要能源、要资源。要强化科技和人才支撑，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水质在线监测等技术手段，提升城镇污水处理科学化、信息化、智慧化水平。要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推进“厂、网、河、湖”一体化运行，深化“供、排、净、治”



一体化改革，实现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化。要完善价格机制，按照覆盖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科学制定污水处理费用标准，创新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经营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监督考核，对于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坚决予以问责。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李斌出席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维作了主题发言。全国政协委员张宝顺、鄂竟平、王复明、王美华、石碧、丁贵杰、程静、黄若虹、冯远、何报翔和特邀代表王凯军发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作了协商交流。（据新华社）

[Top](#)

【韩正：中国政府将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韩正9月9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1年年会并讲话。本次年会以“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主题。

韩正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政府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显著增强了全面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

韩正强调，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坚持绿色发展，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总抓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以人为本，集中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紧盯污染防治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系统治理，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制度创新，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绿色低碳发展财税、金融等政策，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持续实施，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努力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韩正表示，中国政府将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目前已正式批准成立第七届国合会。希望各位委员、各位专家继续建言献策，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据新华社）

[Top](#)

【孙春兰：弘扬尊师重教传统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在第37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北京会见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时代楷模、全国最美教师、教育世家等优秀教师代表并座谈，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转达党中央、国务院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孙春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回信，充分体现了对广大教师的关心和重视，也是对全国教育战线的鼓舞和鞭策。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教育报国情怀，涵养良好师德师风，以自己的学识阅历、模范品行影响和教育学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积极支持和参与“双减”等教育改革，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孙春兰强调，教育的关键在教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的基础性工作，投入更多的政策和资源，健全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保障长效机制，继续实施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加强欠发达地区教师定向培养和骨干教师、校长培训，宣传表彰优秀教师，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职业荣誉感。（据新华社）

[Top](#)

【胡春华：积极主动做好新形势下的外资工作】

外资工作座谈会9月9日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主动做好新形势下的外资工作，不断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

胡春华指出，近年来在十分复杂的形势下，我国外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做好外资工作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是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需要，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要通过利用外资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支持外资企业在国内更好发展，提升中西部地区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能力，鼓励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中立足我国辐射周边。要充分发挥外资在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外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胡春华强调，要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高度重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地见效问题，主动加强对外资企业服务、及时回应企业关切，发挥好自贸协定、自贸试验区等开放机制和平台作用。要促进利用外资持续健康发展，抓住有利时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更加注重优化引资结构、提升引资质量，进一步增强外资企业信心。（据新华社）

[Top](#)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中国要为全球碳定价市场做足准备】

全球气候变化及碳交易市场的价格体系问题，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从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这两者关系的角度来看，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会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能源领域的发展为例，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将意味着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此，未来技术创新以及太阳能的发展，不仅是要以清洁能源替代传统的火力电站，同时也意味着要用更多创新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未来，我认为中国能做好准备迎接全球碳定价市场的到来。

一方面，中国太阳能应用领域的发展已经走在全球前沿：现在全球 75% 的太阳能发电组件都由中国生产，全球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容量 1/3 在中国。在太阳能科技领域，中国很多方面也走在前沿。

另一方面，中国已向全世界宣布了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重要目标，特别是提出到 2030 年实现碳达峰，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大刀阔斧地改变能源结构。毫无疑问，中国将进一步提高能效，在“十四五”规划中，目标是把能效每年再提升 3%。当然，仅仅这样做还不够，因为接下来 5-1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每年还要保持 5% 的增速。所以，中国必须进一步改革能源结构。像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有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中国也有能力实现这样的转型。

中国未来会在全球碳价格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符合中国自身发展利益。此外，希望大家更加关注碳交易市场中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欧盟在提“碳边境调节税”，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国家来说，若要效仿这一措施显然存在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大部分非洲经济体刚刚进入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如果不能完成工业化、没有发展，这些国家就没有前途，谈碳税完全是无本之木。

对于这些非洲国家来说，一方面是如何继续推进其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同时改变这些国家的能源结构，这也将是全球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

不过，存在这个挑战的同时，也可以让非洲国家看到一个机会，那就是通过“跳跃式的发展”走捷径，包括直接发展太阳能，因为很多非洲国家现在是缺电的，燃煤发电肯定不够，直接采用太阳能就像一条捷径，我将之称为“跳跃式发展”。在移动通讯领域，不少非洲国家就跨越了模拟技术的发展阶段，直接来到了数字技术的 4G、5G 阶段。在能源领域，这些国家同样可以经历类似的跳跃式



发展,直接跨越火力发电的阶段进入到清洁能源发电阶段,包括太阳能发电阶段。

非洲国家这样的发展过程,对于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很多企业来说,存在着很多机会,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的企业,有非常多的机会面向有关非洲国家提供金融、技术上的支持和帮助。必须强调的是,西方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评论和看法非常恶意,污蔑中国是“新帝国主义”,这绝非事实。这些西方人士如果真正关心非洲的发展,就应该和中国携手努力,增进和中国在非洲相关发展领域的合作。比如,中国有巨大的制造业产能,包括在太阳能行业的产能非常巨大。而且,中国不光向其他国家提供商业贷款,也提供大量低息贷款,这其中包括面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很多援助。西方国家在非洲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有合作的基础和机会。

【来源:“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作者: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Top](#)

【权利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大差距。最终的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经由权利平等,提高低收入者致富的机会和能力。

■避免共同富裕的认识误区

实现共同富裕,要避免以下认识误区:

首先,富裕不等于财富水平高。财富是存量,收入是流量。财富水平高,可能仅仅反映了账面资产多,而非收入流量高。转移支付可以为低收入者积累较高的账面资产,但是如果资产的使用效率不高,不仅不会带来收入的提升,反而为受援助者带来负担。例如,某些地方为农村地区建设图书馆、公厕、水管等基础设施,但是建成后却无力投入维护资金,致使公共设施废弃闲置。要避免单纯通过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提高财富水平的做法。其次,共同富裕不能靠政府负债来维持。通过政府负债提升公民财富,会带来账面资产的增加,但也容易带来资产产权不清的问题,从而导致资产的实际利用效率低下。

例如,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城市建设开发,形成了大量闲置的工业用地,积累了债务风险,对土地供应的垄断推高了房价。某些地区投资修建的保障房,投入高,但是净产出的土地少,且有不少建好的保障房闲置。为化解债务,某些地方进一步扩大了行政垄断的范围,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利用的效率损失。

只有进一步减少行政垄断,扩大市场范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才能为长期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第三,共同富裕不代表资产共有。人人有份导致财产权分散,资产共有带来资产的使用效率低下。归根结底,是人创造了收入,而不是物质资产创造了收入。资产共有削弱了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激励个体有效利用资产。将资产集中在有能力创造收入流的人手里,从而扩大资产的使用效率,再通过税收、保险、慈善等方式调节,比资产共有能更有效地实现共同富裕。

■权利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赋予低收入群体更多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合作共同创造了收入。收入是靠人来创造的,如果仅仅是拥有物



质资源，而缺乏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也不能持续地创造收入。许多功成名就之士，拥有不少资源，但是缺少人才让这些资产变现，也即利用资产创造收入。人对生意机会的警觉及判断力、构想生意模式的创新力、协调多个利益群体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持之以恒的拼搏努力，才能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效率。低收入群体缺乏物质资本，但是未必缺乏判断力、创新力、整合能力、勤勉努力等多种能力。这些能力的发挥，有赖于低收入群体获得参与市场的平等权利。然而，当前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减少了低收入群体参与市场的权利及致富的机会。

例如，大城市是低收入群体利用劳动力资产致富的重要场所，但近年来个别大城市奉行的“赶人”政策约束了这个重要的致富途径。伴随批发零售业的衰落，大批小微企业主及员工进入大城市从事网约车、外卖、快递员等工作。但是大城市的一系列教育政策、网约车政策，与户籍制度相结合，在限制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自由迁徙权的同时，尤其减少了低收入群体利用其劳动力致富的途径。公办学校等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导致外来人口子女不得不返乡上学，无法随父母迁入大城市。政策要求网约车司机需有这些大城市的户口，限制了外来人口的职业选择。紧张的土地供应导致大城市的房价房租较高，提高了外来人口在大城市的居住成本。

又如，农村居民具有宅基地等土地资产，但是现行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村居民使用宅基地建设商品房并以此做抵押融资的权利，从而提高了农村居民致富的门槛。另外，受限于国内要素市场的分割，小微企业普遍缺少资金及土地等要素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跨区域放贷，缺少服务小微企业的能力。环保、土地等政策使小微企业较难获得合法的用地空间，提高了小微企业主经营企业的门槛。小微企业是大量普通劳动者就业的主体，更多的小微企业、更低的经营成本，方能有效促进广大低收入群体致富。赋予低收入群体参与市场的平等权利，为其发挥才能创造条件，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可以更有效地结合，不但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也能为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这也是2021年8月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的题中之义。

■如何促进权利平等

针对上述妨碍低收入群体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制度性痼疾，笔者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增加人口在大城市、城市群的自由迁徙权。减少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障碍，降低外来打工人口子女在大城市入读公办学校的门槛，减少对外来人口从事网约车等职业选择的限制，这可以增加低收入群体参与市场的权利，为他们增加在大城市中致富的机会提供条件。增加大城市的土地供应，降低外地人向大城市举家迁徙、居住及生活的成本，同样可以增加外来人口在大城市致富的机会。

其次，完善农民宅基地财产权体系是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农村宅基地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根本上是因为宅基地的无偿分配和使用制度，一方面在农村形成了大批合法与非法的一户多宅，另一方面困难居民无力盖房，无法真正享有宅基地权益。伴随建设用地指标的日趋紧张，某些地区的宅基地审批已暂停多年，居民的宅基地权利无法真正兑现。

完善农民宅基地平等权利的一种办法，是将宅基地由实物地块，转变为可以交易的权利。需要清楚界定宅基地的资格权与使用权，允许资格权通过市场交易或置换保障房有偿退出，形成可以跨城乡流转的权票，并允许农户跨村购买权票并有偿使用宅基地，从而真正兑现农民的宅基地权利。



第三，跨省用地指标交易是缩小地区差距及城乡差距的重要抓手。发达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的价格高于欠发达地区，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价格高于农村地区。将落后地区的农村建设用地通过复垦转变为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转让给发达地区的城市，让落后地区的农民有权分享发达地区的城市土地增值，可以提升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也可以促进城乡空间更合理的布局。

2007年开始在重庆试点的地票制度就是利用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为落后地区农民购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现一户多宅的有偿退出、为扶贫和生态保护提供支持的一种土地产权交易制度。地票，是指农村土地权利人自愿将其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地等）按规定复垦为合格的耕地等农用地后，因建设用地减少而形成的用地指标。这个指标可以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

重庆地票的购入方主要是中心城区的平台公司，在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含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用地）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时使用。地票将土地权利从偏远的农业地区转移到了发达的城市地区落地使用，利用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大幅提升了农村建设用地的权利价值和农民收入。

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是老年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重庆允许参与地票复垦的农户购买标准较高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50岁以上农户仅需一次性交纳4.1万元，即可在男60岁、女55岁后，每月领取养老保险，这笔钱500多元开始，每年每月逐步提升，至1080元。这样的制度安排为农民养老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

重庆的地票制度若能推广至全国，实现地票（建设用地指标）的跨省交易，将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共同富裕。据统计，自2013年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全国范围内土地增减挂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资金多达4400多亿元。构建地票跨省交易制度，有助于降低发达地区的用地成本，同时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第四，优化乡村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少数农村居民因“上有老、下有小”而返乡，但白天无事干，聚集在乡镇打麻将。部分返乡居民办小微工厂，为其他返乡居民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因交税少、环保要求高，小微工厂缺少合法的土地供应。可以将农村闲置的宅基地转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者通过乡镇与村庄规划调整，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小微产业园，在不损害城市土地供应的情况下，为小微企业创造空间。环保政策也应精准分类，为地方政府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条件。

第五，破除要素市场的区域、城乡分割，为小微企业构建城乡统一、区域统一的要素市场。允许银行等金融机构跨区域发放贷款，鼓励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探索更多服务小微企业主的金融产品，打通为小微企业主提供资金支持的通道。

【来源：澎湃新闻网，作者：路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Top](#)

【养老金改革是应对储蓄率下行的重要抓手】

当前我国储蓄率处于下行阶段，人口老龄化成为重要推动因素，从养老金财富、储蓄倾向、预期寿命等方面发挥作用。储蓄率的变动还存在多种因素：一是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储蓄率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居民消费倾向上升可能显著降



低储蓄水平；三是居民部门债务高企，通过偿付效应、消费挤出效应、被动的储蓄效应对储蓄行为产生扰动；四是储蓄与投资相互影响，有很强的相关性。养老金制度改革是应对储蓄率下行的关键抓手，专家提出四大建议：第一，借鉴别国经验，关注多元目标，完善顶层设计；第二，要审慎考虑制度改革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出台延迟退休年龄时做好系统配合；第三，积极应对养老金缺口，发展养老第三支柱；第四，养老金制度要兼顾储蓄结构变化，避免助推其他部门债务和风险。

■我国储蓄率当前处于下行阶段

数据显示，我国储蓄率位于全球较高水平，历年总储蓄占GDP比重超过40%。当前我国储蓄率处于下行阶段，2019年国民储蓄率为44.4%，较2010年回落了6.5%；2019年居民储蓄率为34.8%，较2010年回落了7.3%。从结构上来看，政府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等私人部门储蓄是国民储蓄的主要来源。在居民储蓄中，股票、理财等金融储蓄占比快速下降，房产等实物储蓄占比快速上升，据人民银行估算，居民实物储蓄占比从2017年的27.6%上升至2019年的56.8%。与会专家认为，数据表明中国的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储蓄率快速降低会导致结构性指标迅速变化，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冲击。加强对私人部门储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变化的认识。

■储蓄率变动与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

据人民银行测算，2035年我国老龄人口占比可能达到23.5%，老年抚养比可能达到36.7%。与会专家认为，近30年加总数据显示，我国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随着老龄化加速发展，人口老龄化会成为储蓄率下行的关键推动因素。与会专家认为，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储蓄行为的相对重要性也会提升，并通过三种机制影响储蓄率：一是养老金制度的全覆盖使获得跨期收入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幅提高，养老金财富会成为影响即期储蓄行为的主要因素；二是在既定的养老金制度下，人口中位年龄越高，接近退休年龄的人越多，储蓄倾向也会变得更明显；三是不同的养老金制度设计由于影响终身的养老金财富，也会对当期的储蓄行为产生影响。

有专家认为，居民储蓄的变动跟收入联系紧密，人口老龄化会影响收入从而影响储蓄率。退休群体占比提升可能使同样人口数量情况下的劳动时间变少，进而减少工作群体收入。如果消费具有很强的粘性，那么储蓄率会随收入下降而降低。也有专家认为，居民预期寿命增加可以延缓储蓄率下降趋势。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77.3岁，较2000年增加5.9岁。预期寿命增加可能使工作人群为更长的退休时间增加储蓄，也可能通过延迟退休抑制人口抚养比的上升。

■储蓄率变动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

与会专家认为，除人口老龄化之外，储蓄率仍受多种因素影响。第一，宏观经济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速和结构调整与储蓄率都有密切关系。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未来居民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凸显，因而储蓄可能会有相应的下降。

第二，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消费倾向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从2010到2019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57.9%上升到75.1%。在此背景下，年轻群体的消费意愿更强，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迅猛，可能会显著拉低储蓄率水平。

第三，居民债务。2020年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超过70%，通过三种效应影响



储蓄率：一是偿付效应，支付债务利息影响可支配收入，可能降低居民储蓄水平；二是消费挤出效应，债务增加可能会减弱居民的消费倾向，提升居民储蓄水平；三是被动的储蓄效应，债务偿还负担会增加预防性的储蓄，可能提高居民储蓄水平。三种效应共同作用，使得债务对储蓄行为产生扰动。

第四，投资和储蓄关系极为密切。与会专家表示，跨国数据的分析表明投资与储蓄之间具有稳健的相关性。日本和欧洲的经验也表明，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等变量有很强的内生互动关系，由于储蓄大于意愿投资，使得真实利率长期下行。储蓄率太低会使社会缺乏财富积累，储蓄率过高会使得投资规模不足、投资效益降低，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养老金改革是应对储蓄率下行的重要抓手

作为影响储蓄行为的主要因素，充实养老金财富意义重大，养老金制度改革是应对储蓄率下行的重要抓手。与会专家建议：

第一，完善养老金制度的顶层设计。人口老龄化对很多国家的养老金体系都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使得养老体系可持续性受到冲击。有专家认为，美国、日本、欧洲的经验表明，消费不足、投资意愿不足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我们应完善养老金制度的顶层设计，使其既有利于对养老人口的保障，也有利于对储蓄、投资等宏观变量的调整。

第二，养老金制度改革需要审慎考虑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专家表示，制度改革能够影响老百姓的预期，从而对家庭储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05年、2014年养老金改革都降低了养老金替代水平，都正向地影响了家庭储蓄率，养老金财富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力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增强。在人口老龄化和预期寿命增加的背景下，今后出台延迟退休年龄时，要做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系统配合。

第三，积极应对养老金缺口，发展养老第三支柱。有专家认为，依靠财政支持和国有资产划拨，难以补足未来的养老金缺口，必须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壮大长期资本。

第四，养老金改革需兼顾储蓄结构变化。有专家认为，实物储蓄和金融储蓄大多为间接融资，比例提升会推升企业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而养老金储蓄更多地为直接融资。因此，养老金制度改革应该使实物储蓄、金融储蓄和养老金储蓄的占比保持合理稳定，避免推动其他部门债务和风险的增加。

【来源：新浪意见领袖，作者：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Top](#)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王莉霞当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王莉霞当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在9月9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王莉霞当选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莉霞，女，蒙古族，1964年6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政府党组书记，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曾任省政府直属部门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地级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副省长，内蒙古自治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据《内蒙古日报》）

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张柱已任党委组织部部长

据天山网消息，9月3日，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张柱出席并讲话。上述消息显示，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张柱已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显示，张柱，1968年2月出生，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近日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据天山网）

[Top](#)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黄群慧：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充分认识共同富裕这个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深刻内涵，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通常表现为一个国家为达到世界先进、前沿和发达水平的发展过程。自18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主旨，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的主流和前沿。但在这一次现代化过程中，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被甩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后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近代以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成为众多仁人志士的伟大梦想。近代中国在历经众多失败的探索之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启并走上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人口众多、底子薄弱、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基础上，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地推进了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中创造了世界奇迹，形成了充满新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基本成型。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 and 制度体系日趋完善，物质基础更为坚实，全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更加自信。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虽然各个国家成为世界先进、达到发达水平的目标基本趋同，现代化进程中也遵循关于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共同的规律，但从整体上看，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成功现代化模式或道路。先发的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虽然对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借鉴意义，但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最终是由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一定是符合其基本国情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进行有效结合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同志用“小康之家”这个概念描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到2000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首次综合表述为“小康”。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把现代化战略部署分为了“三步走”。在1997年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规划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确认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又分为两个阶段的部署，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具体规划了第一阶段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具体目标，提出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正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发展阶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目标要求和实现路径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现象和发展过程，体现出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而且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最为根本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立足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一国情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个根本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个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显著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时，也强调了共同富裕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定具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重要特征，这内嵌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和原则之中，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共同富裕可以是一个状态或结果，也可以是一个过程或行为。作为一种状态或结果，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是全社会所有人的整体富裕。共同富裕，与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反义”，与平均主义的“均富”不“同义”。共同富裕所描述的不是少数人富裕、贫富差距巨大的状态，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同等富裕、一样富裕的情况。作为一个过程或者行为，共同富裕意味共同致富和共同发展，全体人民都有追求发展、勤劳致富的共同权利和机会，通过共同努力和共同奋斗的过程，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也不是没有差别的同步富裕，可以一部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状态或结果，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作为一个过程或行为，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从目标要求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要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一方面是要实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发达状态，即“富裕”，另一方面是要让现代化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满足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即“共同”。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目标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初心使命，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衡量标准。从实现路径看，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形成人人参与发展过程、人人享有发展成果的公平普惠的环境条件和制度体系，动态把握发展生产力与消除两极分化两方面的现代化战略任务，形成既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又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现代化政策体系。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步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要求，到 2035 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把握好以下两方面的政策思路。

一方面，保持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实现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保证“富裕”。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要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创新驱动保证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才能不断提升“富裕”水平、增强持续做大“蛋糕”的能力。基于现代化规律，一个经济体到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经济潜在增速便开始下降。根据人口预测模型、资本存量估算、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等测算结果，我国经济增长还有足够潜力，有能力到 2035 年人均 GDP 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也要看到，这一发展潜力的基础还有待加强。为此，在



新发展阶段，既要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有效协同，以实现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又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实施高水平开放，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和高水平自立自强能力，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不断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另一方面，以完善分配格局为重要抓手，在促进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动共同富裕。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具体到分配领域，需要关注以下内容：进一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继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一次分配注重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协调性，二次分配聚焦公平公正，三次分配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提高社会流动性，逐步提升全体人民收入水平、财富存量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完善分配格局不仅会直接促进共同富裕有实质进展，也会促进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的形成，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黄群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Top](#)

【黄益平：中国保持对外开放、融合的态度不会变】

中国有可能提前达到世界高收入经济体门槛

受疫情冲击以后，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复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从全球经济来看，疫情期间中国的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但整体而言，经济复苏领域存在不平衡现象。2020年，政府采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公共卫生支出、税收减免以及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等“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来稳定经济主体，在控制国内疫情的前提下，有效稳住经济主体，经济反弹比较强劲，尤其是出口，增长迅猛。疫情后期，经济反弹主要靠出口带动，投资和消费领域的增长动力不太平衡，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比较强，制造业的投资一般；消费领域，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比较强劲，中低收入家庭相对疲软。疫情期间能够保持较高出口量，因为中国有效控制了疫情发展，恢复了生产。未来，等全球大部分国家控制住疫情，逐渐恢复生产之后，中国的出口量是不是还能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就不好说了。

《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是疫情之前出版的，书中提到，2025年前后，中国可能达到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现在看来，也许中国不需要等到2025年。根据世界银行及联合国的指标，高收入国家门槛被定为人均GDP12600美元。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1000美元，只要保持平稳增长，明后年中国应该可以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老百姓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人均收入增长。但由于国内居民人均收入存在地区差异，可能东南沿海大多数城市早就是高收入经济体，但西部、北部地区人均收入仍然低于平均值。当然，世界各国都存在地区差异或者群体差异，即便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国土面积不大、已经是高收入经济体，内部收入差异依然存在。中国地域相对更大，差异性也更明显。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时，人均GDP只有156美元；43年后，人均GDP增长了60多倍。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正好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同步发生。中国依靠低成本优势，迅速崛起，成为世界重要的出口国之一。目前，中国企业正在面临失去低成本优势的经济挑战。

上面所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指大多数国家都有能力从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很难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因此，多数国家达不到高收入国家门槛。由于成本提高，必然要求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保持持续的创新能力和。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能力进行创新，无法适应市场需求，最后只能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全球有很多国家长期处在中等收入水平。对中国而言，未来两三年可能将跨越中等收入的挑战，而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对创新能力的依赖度会越来越高。现在，一部分中国企业在创新上做得非常好，5G、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中国有明显的优势。中国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匹配，但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一些科技领先国家相比，创新方面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数量很多，但质量很难与领先国家相比，绝大部分是应用型的，甚至就是改变包装，“黑科技”很少。所以，中国需要努力提高创新能力，持续、快速地逼近国际技术的前沿。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中国缓解因为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中提到，中国从2019年到2049年可能面临老龄化过程，人口抚养比会上升至66%，劳动年龄人口起码减少1.7亿人。劳动人口越来越少，供给、生产能力降低后，经济发展就很难持续高速发展。比如，日本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之后，劳动力总量减少，经济增长肯定就不像过去那么强劲。

当下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缓冲或者抵消这种劳动力短缺，减轻老龄化冲击的程度。未来，越低端的劳动越容易被机器替代，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可替代的技能水平会不断提高。简单来看，重复、低技能、不需要个性化情感应对的劳动，比较容易被机器替代。未来，随着科学大幅度进步、计算机技术显著提高，也许有一天机器人可以替代医生直接给人看病。的确有人担心，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会对就业市场产生很多消极影响，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任何技术革命，都必然会带来正面的效率的提升和负面的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等问题，所以，社会政策应该高度重视。如果一部分低劳动技能的岗位被机器替代，社会政策应及时跟上，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劳动者失业后的生活，有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非常重要。目前数字经济在全球迅速崛起，尤其在疫情期间，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迫在眉睫。疫情也可能产生所谓“破窗效应”，一方面对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冲击，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许多新的经济机会，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在疫情结束之后大大加速。

保持开放，短期对国内的经济大循环更加重视

过去40年，中国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当下，中国如果想继续依靠外部市场以及外国的直接投资，靠大进大出支持国内的经济增长，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有逆全球化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体量已经很大，如果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占比不断增长，也会带来不平衡。

中国的一举一动，同样会对别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在经济发展中，任何时候任何国家要从一般规模的经济体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肯定要受到外部正面



与负面的影响。如果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正面影响是能持续保持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带动很多国家一起走；而负面影响是会引发一些结构的调整，比如市场份额再分配。当中国在国际市场、国际经济增长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容易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如何处理好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敏感，但不可回避。

从目前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来看，未来中国可能无法继续保持高出口率。客观做一个预测，我觉得现在国内经济内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由此就采取对内的政策导向。中国保持对外开放、融合的态度不会变，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国内和国际经济大循环相互合作。

强调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性，符合经济发展逻辑。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的经济力量非常弱，需要通过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融合、通过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带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那个时期，国际经济大循环很成功。发展到今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大。目前，由于贸易冲突、经济关系紧张等因素，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新挑战，此时，把重心转回国内，构建或者改善国内经济大循环，很有意义，也很重要。

国内大循环，一方面可以增强国内的需求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改善供给方面的问题，提高创新力和效率。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国继续保持开放的经济政策是不会逆转的，只是在短期策略上，需要更加重视国内的经济大循环。

企业面对逆全球化挑战，一方面是保持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要抓住大的国内经济循环战略，把精力和关注点放在国内的市场上。不是不关注国外市场，今天我们讲国内经济大循环，是因为当下国际市场发展变得相对困难，国际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肯定也会减弱；再加上中国没有低成本优势，所以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更好地关注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关注中国的消费趋势，肯定是新的热点。

随着中国经济体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成熟，增长速度会不断放缓，这是一个一般规律。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可以简单地学习其他国家既有的技术或者管理经验，发展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当中国越来越逼近国际经济技术前沿，需要更高的原创能力，经济发展速度也必然会放慢。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将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从而顺利地实现中央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来源：新浪意见领袖，作者：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Top](#)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国际粮价为何高烧不退】

9月2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最新月度报告显示，2021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达127.4点，环比上升3.1%，比2020年同期上涨32.9%。这个数值已经接近今年峰值5月的127.8点，离2011年全球粮价指数的历史纪录131.9相差不远。此前，《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2021年国际粮价持续维持高位，可能致使全球至少1.55亿人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境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全球饥饿贫困人口不减反增，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大难题。可以说，全球粮食安全赤字有增无减，世界正濒临50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天灾是粮价高企之“标”

自古以来，全球种粮农民往往“靠天吃饭”。对于洪水、干旱、台风等极端天气，种粮农民难以抵御。2021年，全球频频出现极端天气，不仅造成人员伤亡，更是影响粮食生产。据估计，今年美国的小麦、玉米和大豆产量以及库存可能会降至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农业部8月份供需预测报告显示，美国小麦预期产量为4618万吨，创19年来的新低。加拿大预估减产更大，预计将减少超过30%，仅为2400万吨。在南半球，被称为“南美粮仓”的巴西，5月份至今，遭受着严重干旱和霜冻双重打击，不断冲击着全球各类大宗商品的供应链。在俄罗斯，作为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由于天气干旱，其小麦产量同比预估将减产15%，预计为7250万吨。在欧盟，受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小麦及大麦收成锐减。随着产量大幅减少，农作物的价格明显上涨，国际谷物理事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小麦出口价格上涨了46%，而联合国粮农组织也表示全球食品价格已涨至10年来的新高。专家表示，如果极端天气持续下去，农作物价格还将继续攀升。

■人为因素是粮价病灶之“本”

不可否认，极端天气是造成全球粮价“高烧”不退的重要因素。因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指出，粮价的飙涨主要是因为极端天气造成全球粮食产量预期的下降。但是，正确认识理解全球粮价上涨的原因，我们还要看到天灾背后的因素，特别是人为的因素。粮食作为世界大宗商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具备



金融产品属性，受到国际货币政策、资本炒作和定价权等人为因素影响。此外，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战略物资，受到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在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人为造成粮食流通受阻进一步推高了恐慌情绪。

一是人为货币放水推高粮价。在疫情蔓延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下，美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为了缓解经济压力，美联储开动印美元模式，开启大水漫灌的模式。从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先后通过了3轮财政刺激计划，向市场投放了5万亿美元用于刺激经济恢复，4月又通过了1.8万亿的家庭计划，8月4.7万亿还在继续通过审批。按美国财长耶伦的说法，放水势必会让美国财政赤字变大。从美联储大放水开始，包括国际粮食价格在内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暴涨。粮食既是重要的生存物资，又是重要的基础原料，于是成为各国纷纷争抢的对象，国际粮价开启了“高烧模式”，已经接近10年以来新高。

二是资本炒作推波助澜。美国不仅控制着四大国际粮商，垄断着全球80%的粮食贸易量，而且控制着全球粮食期货，牢牢掌握着全球粮食定价权。粮食作为大宗商品，交易一般都采用期货交易模式，其定价也以期货价格为基准。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最发达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中心，为美国与全球农产品提供了价格基准。影响芝加哥期货价格的一个关键因素，便是美国农业部的各种报告和发言，因此，美国农业部只要动动嘴皮就可以影响期货价，继而影响全球农产品价格，美国也由此牢牢掌控着全球农产品定价权。今年以来，市场炒作和疫情影响，推高了市场对粮食的恐慌心理，粮价也在诸多因素的叠加综合作用之下上涨。实际上，从全球粮价“高烧”中获利的大多是美国资本。

三是人为断链加剧缺粮恐慌。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粮食产量下降了20%。越南、俄罗斯、加拿大等粮食生产大国为了防止国内粮食价格上涨，限制甚至停止粮食出口。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较大冲击，加之一些发达国家因封城措施导致民众恐慌囤积食品，而那些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更是陷入了极大的被动。此外，受燃料价格上涨、船只供应紧张和港口装卸时间延长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海运价格呈现上涨，进一步加剧了缺粮的恐慌情绪。

■ 国际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急需改革

当前国际粮价“高烧”不退，触动着全世界人民的神经。实际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虽然受到疫情和极端气候等因素影响，但各国和国际组织采取的措施与联合行动，能确保全球粮食供给充足，确保疫情期间全球粮食价值链运转顺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2020年全球谷物总产量达到27.65亿吨，创历史新高，比2019年增加5800万吨，全世界粮食的总供应量足以满足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存在不合理不公平现象，全球粮食供应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粮价仍存在过度金融化资本化的弊端，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粮食供应的主导权和粮价的控制权，疫情推高了全球粮食安全的风险，依赖粮食进口的低收入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要解决当前全球粮食领域的问题，治理气候变化问题、遏制极端天气频发只是“标”，更重要的是要改革国际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本”，向着更公平更平衡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要看到，我国粮食已经保持了“17连丰”，最近6年一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已连续多年超过国际通常认为的人均400公斤粮食安全标准线。2021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582万吨，比2020年增加296.7万吨，增长2.1%，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完全有保障，中国人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要积极作为，坚持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统一，树立全



球合作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的意识，加强团结协作，深化和平合作、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共赢共享的伙伴关系。要完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在后疫情时代加强合作，通过联合国等机构，减少全球饥饿和贫穷现象，破除人为制造粮食危机的现象，推动“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要将农业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发展方向。在沿线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从政策、技术、综合角度采取提升共同体粮食安全的措施，在沿线国家大力推广绿色农业，确保沿线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平，实现“一带一路”粮食共同安全。（据《光明日报》）

[Top](#)

【英国增税 360 亿英镑惹众怒】

受一年多来的新冠疫情影响，英国社会护理费用出现巨大缺口。现在，英国政府决定通过加税来填补财政赤字的亏空以及改革社会护理系统。但改变往往没有那么容易，加税的计划不仅招致了英国议会内外的反对，也违背了 2019 年英国大选之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做出的不会提高所得税的承诺。

■ 补贴卫生系统

当地时间 9 月 7 日，约翰逊宣布实施增税计划，称三年内将增税 360 亿英镑，以缓解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危机，并且资助医疗保健和国家社会护理系统的改革。具体而言，约翰逊计划提高全英国的员工、雇主和个体户全国保险税（NIC）税率：2021-2022 年的全国保险税率分别为 12%、13.8% 和 9%；2022 年-2023 年分别升至 13.25%、15.05% 和 10.25%。增税对英国民众的具体影响，英国广播公司（BBC）6 日称，增税计划意味着年薪在 3 万英镑以上的人，每年将多交 255 英镑的税。而年薪 5 万英镑以上的人，每年将多交 505 英镑。

除了个人，企业也要支付更多的税。据了解，三档股息税将分别提高 1.25% 至 8.75%、33.75% 和 39.35%。“我们的新税种将在个人和企业之间分担成本，那些收入较高的人将支付更多。由于我们也在提高股息税率，要求更富裕的企业主和投资者也做出贡献，收入最高的人将支付大约一半的收入。”约翰逊说道。

通过增加税收，约翰逊政府的目标是解决社会健康服务治疗方面的危机，随着新冠疫情期间卫生保健服务压力的不断增加，英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在急剧上升。据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估计，疫情导致 NHS 每年需要额外投入 150 亿英镑。此外，这笔钱还将用于改革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如果英国人的储蓄和资产超过 23350 英镑，他们必须自己支付医疗费用，这意味着社会医疗很少由国家资助。

这方面的改革一直是英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因为人们经常被迫卖掉自己的房子，以支付医疗费用。据英国天空电视台报道，在改革后，这一门槛预计将升至 10 万英镑左右。据政府称，新的征税计划将从 2022 年 4 月开始实施。不过，这些计划还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才能被写入法律。

但是，约翰逊已经等不及了。他日前在下议院对议员说，如果不给 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所需资金，就无法解决新冠疫情积压的问题。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了。英国智库财政研究所（IFS）称，如若约翰逊此次征税计划成功，英国政府税收收入有望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 “彻头彻尾的车祸现场”

虽然约翰逊的“画饼”看起来很美好，但这个决定遭到该国保守党内外激烈反对。他们认为，首相这么做将公然违背 2019 年竞选时不会对英国工人增税的



承诺。保守党议员和内阁大臣纷纷警告，约翰逊如果坚持这么做，将会失去选民信任。保守党议员史蒂夫·贝克（Steve Baker）在特雷莎·梅（Theresa May）担任首相期间是脱欧的关键反对者，他对《独立报》表示：“在所有为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社会护理筹集资金的方法中，违背税收承诺，提高国民保险税肯定是最糟糕的。在这个危机时刻，我们需要对国家的所作所为和资金来源进行零基础的审查。”

而前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近日表示，提高税率将引发损害政府的“非常显著的反弹”，他宣称要在上议院反对这样的计划。还有一名前大臣称，约翰逊“试图安抚所有人，结果却让我们所有人都失望了”。他补充说，唐宁街已经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车祸现场，已经让我们逐渐失去耐心”。

不少议员反对增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公平问题。英国《卫报》6日报道称，领导北方保守党集团的议员杰克·贝里认为，让低收入者缴纳更多的税来帮助较富裕的退休人员“保住房子”很不合理，“我个人不相信增加国民保险是一种公平和公正的方式，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很多人已经做出巨大牺牲来确保其他人得到安全保障”。除了政府与议会，英国商界也对此表示不满。英国商业组织批评称这增加了因新冠疫情而苦苦挣扎的企业的负担，并将令就业岗位减少。

英国商会（BCC）经济主管 Suren Thiru 表示，“企业强烈反对提高国民保险缴费，因为这将在一个绝对关键的时期拖累就业增长。在企业已面临一系列新的成本压力的情况下，上调税率将对更广泛的经济复苏产生重大影响，并打击推动复苏所需的创业精神”。不过，民间对加税的反对没有那么强烈。根据 YouGov 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社会对加税填补社会照护费比较宽容。7月20日出炉的民调显示，在是否支持将全国保险税率从12%升至13%以资助老人看护的问题上，四个年龄段英国人的支持率都大大高于反对率。

■还要头疼多久

对于加税的计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认为，英国的税收已经相对较高，进一步增加民众税收负担并非易事。崔洪建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民众能够得到什么回报，以及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细节。约翰逊所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增税，而在于不能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来换取选民对他的信任，这一举动将十分冒险。

在种种艰难面前，英国政府面临的不只是对加税的怨声载道，还有对其在新冠疫情等问题上的新一轮抱怨。《卫报》援引一位前大臣的表态称，“政府将面临艰难的时期”，不仅是“对于不遵守承诺的质疑声”，还有对公共开支紧缩、“脱欧”冲突的不满，以及要求应对疫情的呼声越来越高。当地时间9月6日，英国英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地区数以万计的学生重返校园。当天，英国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4.1万例，死亡45例。累计感染人数已突破700万例。各方普遍担心，学生返校后感染人数会随之再次上升。

除了校园复课，还有数万公司员工重返办公室。数据显示，有超过200万人次当日乘坐伦敦地铁，这也是自疫情18个月以来，乘客人数首次突破200万。针对英国当前充满变数的疫情形势，以及冬季将至可能面临的更严峻挑战，英国疫苗大臣纳迪姆·扎哈维重申，9月底英国将实施疫苗通行证制度，进入大型场所和参加活动都需要出示两剂疫苗接种证明，并强调竭尽一切所能让英国避免第四次“封国”。（据《北京商报》）

[Top](#)



【我国与东盟贸易发生巨大变化】

海关总署9月10日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双边贸易保持高速增长。2020年，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前8个月，我国对东盟进出口5539.2亿美元，增长33.3%，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4.5%。

■贸易规模快速壮大结构优化

30年间，我国与东盟贸易发生巨大变化。据海关统计，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由1991年的83.6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6852.8亿美元，年均增长16.5%，比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年均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自199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我国与东盟国家交往日益密切，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2013年中国与东盟携手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9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全面生效，双边经贸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商品种类少、贸易规模小。此后，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我国对东盟出口比重逐渐提高，同期自东盟进口原油、橡胶和原木大幅增长。进入21世纪，我国对东盟出口机电产品、纺织服装、钢材、手机、船舶、家具、水果、汽车和医药品等增势良好；自东盟进口农产品、橡胶、石油、天然气、煤等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保持较快增长。双方互补性的贸易结构逐步形成。

■双方企业通关享惠更加便利

近日，广西农垦明阳生化有限公司自东盟进口的淀粉在钦州港口岸通关，凭借提交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证书，该批货物减让关税6万多元。“可别小看原产地证书，这可是帮助我们降低交易成本的‘纸黄金’。”广西农垦明阳生化集团外贸业务负责人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以来，中国海关牵头与东盟完成原产地规则升级谈判并顺利实施。对外全面加强同东盟各国海关的沟通和协作，积极推进原产地电子联网；对内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进出口企业充分享受协定的关税减让政策。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企业享惠进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3.3万亿元，年均增幅27%；双方之间90%以上的货物可享受零关税待遇，共计减让税款3149亿元。“我国和东盟经济贸易互补性强，增长潜力大。”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表示，为更好服务企业开展对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辅助和信息支撑，海关总署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编制“中国-东盟贸易指数”，在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首次对外发布，作为双边贸易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对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起到积极作用。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效应凸显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中新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印和中马“两国双园”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实施，有效提升了我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水平，双方跨境物流更加顺畅。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线路从2017年的“渝桂新”1条线路拓展为6个方向常态化开行，开行频次由每周1列增至每天10列以上，已成为西部地区货物出海出边的主通道和RCEP框架下连接中国与东盟地区最快速、最便捷的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衔接，今年以来累计衔接发送1504个标箱，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了可靠运力支撑，充分激发我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潜力。为保障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的顺利开行，通道沿线15地



海关签署《区域海关共同支持“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合作备忘录》，建立联络协调制度，加强业务统筹协调，共同推动区域海关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深入推进监管制度创新，疏浚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和通关障碍，切实提升通道沿线贸易安全与便利化水平。（据《光明日报》）

[Top](#)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把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城乡关系变迁、工业扶贫变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构建】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阶段性重大成果。2021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衔接转折之年，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不仅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时还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回顾1949年以来的扶贫道路，我们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为世界减贫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经验和方案。从1978年到2019年底，中国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到0.6%。在中国的扶贫历程中，不少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减贫工作经验进行了跨时段的总结和梳理，形成了新时期开展贫困治理的重要基础。扶贫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和再实践。但对相关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发现，从工业角度对中国70余年扶贫工作进行分析、总结与梳理的研究较为薄弱。客观上看，工业发展以及工业扶贫对于中国扶贫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意义，故本文尝试从工业扶贫的角度对中国百年的城乡关系以及1949年以来的工业扶贫工作进行总结和梳理。这既是对中国工农与城乡关系的系统分析和总结，也是对工业参与扶贫工作的再研究与再深化，有助于我们在新阶段重新审视工农与城乡关系，也有助于为新阶段的农村工作提供可行的思考与着力方向，为实现相对贫困治理和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脱贫攻坚战能够取得全面胜利，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道路的坚持，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全国上下形成的脱贫攻坚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在这场举国一致的脱贫攻坚行动中，工



业与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20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40.71%，主要来自非农产业，而工业企业与服务型企业提供了最大比重的就业岗位。经过70余年的工业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拥有所有大、中和小的工业门类。从1952年到2018年底，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近971倍。中国工业的辉煌发展历程，不仅是中国经济辉煌历程的最好体现，更是中国通过经济发展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并奋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生动实践。工业发展历程不仅是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扶贫的一条重要线索，更是中国对国际减贫工作的重要贡献。

一、中国工业发展与城乡关系的百年回顾

从国际范围看，完成工业化都需要资金的原始积累，而利用农业积累优先发展工业在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工业的发展道路是极富特色的，作为中国工业基础的乡村工副业，从农业中脱胎而来，同时紧密依靠县乡村三级城乡体系。对工业发展阶段的理解，离不开对城乡关系背景的认识与理解，故在下文的分析中，本文将工业发展阶段与城乡关系进行了有机融合，以便充分呈现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为后文的讨论做好铺垫。

（一）工业零落停滞与城市优先的发展阶段

1949年之前，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且饱受战争创伤，仅有的工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域，多数工业企业的实际控制者为帝国主义列强，工业形态主要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其产值占全国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3%，而当时的工业产值不到农业产值的一半，工业基本上处于小规模且进程停滞的状态。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发展主要在革命边区进行，主要目的是服务革命战争。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其重点发展了军事工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看来，农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因此确立了工业农业并举的发展思想。毛泽东对于工业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富国强兵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扫清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障碍，通过激发全民创造力，夯实工业发展的基础，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思想的确立也构成了工农城乡关系的另一种辩证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前，农村衰败与农民破产的情况极为普遍，与此同时，城市则展现出畸形繁荣的态势。大量的农业剩余被汲取到城市，大量的农村财富和优质人力资源也因体制的原因而涌入城市，面对严重失衡的城乡工农关系，尽管国民政府和社会力量采取了一些措施并掀起了一些社会运动，但收效甚微。由此可见，当时的城乡关系是极不均衡的，农业和农村构成了工业汲取资源和利益的重要空间，而处理好生存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提升体系的关系问题，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改革与发展工作的核心议题。

（二）工业发展起步与城乡分割发展阶段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认为中国农村实现乡村工业化的道路是可行的、切实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手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占比较高，相关统计显示，1949年时，个体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3%，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70%。1955—1957年，农村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农村副业也成立了专门的合作社或合作组。依托合作社发展乡村工业在客观上也暗合了费孝通关于中国乡村工业化道路的判断。而后，农村工业化出现了阶段性高潮，集中出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



期。当然，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也没有脱离当时中央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且优先发展重工业恰恰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消费市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这一方针也是当时反贫困思想的主要表现。这一时期的农村工业发展仍以人民公社为主导力量，农村工业主要集中在人民公社一级，大队举办工业的情况相对较少。1961年，农村产权进行调整，农村生产队成为农业产权的实际主体。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队办企业成了中国农村工业的主体，1970年队办工业产值占工副业产值的近60%。当时的社队企业几乎涵盖了种植业以外的所有领域，包括农业机械修理、配件生产和农产品简单加工等，对国有工业形成了有益补充，为农业生产与农民生产基本需求的满足提供了重要支持。此阶段的手工业对扩大社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便于妇女从事生产。乡村工业以农业剩余进行投资，土地产出的集体份额转化为社队工业，而投资后形成的回报又进一步回馈了农业和农村，实现了支农、补农与养农的功能。这一阶段发展乡村工业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即实现全民所有制，故此，乡村工业的发展一定是要回馈乡村与农民的。

与农村工业发展同步的是，国家在这一阶段着力发展城市重工业。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新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为之后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针对这一时期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轻工业是源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而汲取农业剩余甚至是农村工业副业剩余就成为支持城市重工业发展的有限可行路径。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家从农业行业提取了大量的资金和实物以支持城市重工业的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战略导致农业农村的发展在一定阶段内被迟滞，但中国发展方向始终没有偏离益贫的道路。从工农关系上看，1970年之前，中国仍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农业产值仍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主体；1970年之后，随着一大批工业项目的实施与投产，工业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

（三）工业均衡发展城乡有限互促阶段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工业结构以轻重工业的均衡化发展为特征，直到20世纪末期，我国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基本相当，而农村工业化和国家整体工业化则构成这一阶段减贫的基本动力。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农村改革首先启动，随之而来的是乡镇企业的快速兴起，乡镇企业以工业企业为绝对主体，其产值与数量是社队企业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后，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是推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正是因为面向农村市场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让乡镇企业和城市工业获得了更大的农村市场。1984年，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人民公社体制被乡镇体制取代。在1980年代的乡村工作中，国家推行的是“离土不离乡”和“三就近”原则，这从客观上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扎根乡村并服务乡村。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尽管随后的发展经历了波折，但在20世纪后期，其总体发展是较为顺利的，到1988年，中国乡镇企业数量超过1800万家，企业总产值超过6400亿元。1992—1994年，中国乡镇企业的年增加值均超过50%，到1999年，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有近30%。以上海农村工业为例，其在1997年时，农村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43%，农村工业新增产值占全市工业新增产值的近70%。而在全国，到1995年，农村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近50%。随后，乡镇企业进行了大范围的产权制度改革，到2000年左右，全国90%以上的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乡镇企业也转型为现代企业，这是市场化改革举措推动工业转型发展的客观体现。与



乡镇企业发展一致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农业生产领域的产业组织化也得到快速发展。相关研究发现，到 2002 年，中国农村产业化组织数量超过 9.4 万个，比 1996 年增加了近 7 倍，产业化经营组织所带动的农户数量占全国农户数量的 30%。在乡村工业的组织形式上，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这一阶段显著增加。

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政策的松动，到 1989 年，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达到 3000 万人。但在当时，面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国家层面仍以严格控制与管理为主。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起一直到 20 世纪末，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吸纳了一大批“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从这一阶段开始，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构成的重要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工业经济的活力，出现国营、民营、外资和合资等多种企业形式，不同所有制企业相互促进，工业品短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到 2000 年时，中国工业增加值位居世界第四，同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数量接近 1.3 亿。

随着城乡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装备水平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动力、农村用电和化肥使用量等显著增加。2003 年底，农业机械总动力超过 6 万万千瓦，是改革开放初的 5 倍多；农村用电量超过 3400 亿千瓦，是改革开放初的近 14 倍；化肥使用量超过 4400 万吨，是改革开放初的 5 倍。工业产品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直接带来了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出的大幅度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业经营性收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到 1998 年的 20 年间，工业补农建农资金超过 1000 亿元，21 世纪的最初 5 年，年均反哺资金则超过 150 亿元。

（四）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新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工业与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的交融不断提升，这一阶段，我国工业不仅承接了大量的国际产业转移，也进一步强化了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制造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发突出。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大为增强，但工业关系的扭曲与工农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调整工农关系的新指示，即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农与城乡的协调发展。学术界也认为，在此阶段，中国农业出现了从养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2004 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问题，由此进入国家主动为农业农村发展开展政策设计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实现了从资源汲取到资源输入的转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民生活持续改善。2006 年，国家正式全面取消农业税，同时建立了针对化肥、柴油和种子等农资的直接补贴，新农村建设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从这一阶段工业发展的地区结构看，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增速高于东部地区，工业发展呈现大国雁阵格局。在工业就业扶贫的带动下，我国农村居民从工业企业中获得的收入从 2000 年的年人均 760 元上升到 2005 年的年人均 1100 元；2007 年底，中国 GDP 的 30%、工业增加值的 45%、出口产值的 40%均来自乡村企业；2008 年，全国规模以上的乡镇工业企业超过 20 万家，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国乡镇工业增加值的 70%以上。

在工业反哺农业和国家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农业现代化的各方面条件不断改善。2012 年底，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超过了 10 亿千瓦，全国农作物经营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50%，农田实现有效灌溉的面积达到全国农田总量的一半以上，农业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也超过 50%。截至 2012 年底，中国有农业产业化组织



数量近 30 万个，覆盖了全国超过 40% 的农户，占有全国农业生产总量的 60%；龙头企业所生产的农产品和加工产品占据市场 1/3 的份额，龙头企业服务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功能显著增强。在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推动下，农业发展也被注入工业化的理念，工业化农业更成为不少地方推进农业产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选择，农业生产中的化学制品和能源应用更加广泛。

改革开放 30 年后，中国农村实现了总体小康，农民年均收入从 100 多元增加到 4000 多元，贫困人口减少到 1400 多万。从 2001 年到 2010 年，全国重点贫困县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 11%（未扣除价格因素），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乡村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乡村科教文卫等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整体上看，这是中国工业能力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后期，我国开始大规模吸引外资，同时引进大量国外先进工业技术，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更加多元且规模不断扩大。

（五）工业深化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进入工业化后期，单纯的政策给予已经无法继续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深化改革成为客观需要，工业深化改革，农村改革也同步全面深化。“十二五”以来，我国在工业技术和制造技术等领域围绕创新与提质出台了密集的措施，工业技术取得突出成就，一些工业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为了应对工业发展的现实需求，2012 年后，我国对重工业进行了优化调整，部分产能过剩的重工业出清，同时高质量的轻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占比提升，工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展开，工业经济发展进入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四化同步”的发展道路，即实现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客观上要求大力推进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推动工业的智能化发展，实现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集成应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2018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 30.52 万亿元，是 1952 年的 2500 多倍。从具体的工业行业情况看，2012 年以来，汽车制造和通讯及电子产品制造业成为工业领域产值占比最高的两个行业；从要素结构看，2012 年以来，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再次回升，2017 年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接近工业总量的 2/3；从技术结构看，我国工业的高技术化趋势不断增强，到 2017 年，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占全国工业的比重超过 30%，达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水平。

2014 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 GDP 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但因农村居民的收入基数较低，其与城镇居民的收入还有一定的差距。2015 年，国务院推动的“双创”政策落地，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得到优化，个体创业与返乡创业的情况显著增加。在东部沿海推动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对人才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吸引力增强，东部地区被挤出的行业多数转入了中西部地区。在政策红利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在该阶段，以工业发展为推动和支撑，农业领域的三产融合发展取得显著进步，截至 2016 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业收入超过 20 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是农业总产值的 2 倍多，截至 2017 年底，全国有省级以上的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1.7 万家。

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显著缩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这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2017 年，全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比重下降到 27%，与改革开放初相比，下降了将近 2/3，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所能够承载的就业人口比重仍将进一步下降，工业仍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载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 2.89 亿，乡镇企业与农业农村的关联更加紧密，其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也不断增强。

在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工业成果被应用于农业领域。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工业技术和产品的应用，使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信息、生物、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于农业农村各领域。1978 年至今，我国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加了 180 多倍，农业创新发展动力不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 2035 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 年，我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工业而言，到 2035 年，我国工业水平将达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的中等水平，到 2050 年，我国将成为世界制造强国的前列成员。当然，针对当前阶段的中国工业化发展，一些研究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尤其是关于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的问题。该问题强调，在工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前提下，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下降，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基于此，研究者呼吁中国仍需做好深度工业化发展工作，中西部高质量工业化发展的任务仍然繁重。与之相反，在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越来越多的地区出台了多样性的工业与企业扶贫工作计划，这也说明工业扶贫在精准扶贫阶段已经全面且深入地介入了扶贫工作。

二、工业扶贫的历史阶段及其内涵

农业支持工业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如果没有农业以外产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而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也是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工业通过自身的发展，不仅能够吸纳并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还能够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本部分的论述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

（一）工业起步阶段的间接性溢出效应扶贫

改革开放前，国家的扶贫工作主要依赖紧急救济和民政救济，为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减贫打下了坚实基础。起步阶段的工业化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反哺与减贫效应，这是因为当时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局限于城市地区，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国家相关政策主要是从农村汲取资源支持城市和城市工业的发展。但反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对于反贫困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前文所述，此时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得农业剩余可以实现工业转化，从而提升农村的整体收入水平；而且，城市工业的发展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这一阶段农业水利设施的建设 and 农业机械的供给让农业生产的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以钢铁、煤炭、电力、石油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城市重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动力与能源支持。不过，工业对农业的汲取与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和支持仍是不对等的，因此工农发展与城乡发展的差距在该阶段仍在进一步扩大。这一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和农村的能力较弱，其在政策制度层面缺乏明确的体制机制，因此，我们将该阶段的工业扶贫称为间接溢出效应的扶贫。所谓间接溢出扶贫效应是指，工业的发展并没有明确的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标，这种扶贫效应随着工业发展及其产品市场的需求而在客观上具备了扶贫的功能。区域经济发展与行业经济发展间就存在这种显著的溢出效应。也有研究者将此阶段工业对农业的反哺称为“滴落效应”，即工业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推动是十分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农民与工业化进程是完全隔断的。在该阶段，通过行政干预方式调整工农关系与财富分配，以实现快速工业化，对于我国摆脱贫困并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很有价值的。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



启动了以大小三线建设为核心的区域工业化建设，这不仅奠定了中西部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且有助于缩小不同区域间的工业发展差距，更在客观上缩小了特定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工业的有限经济增长除了投入工业化之外，其他的经济增长成果都投入到了社会发展领域。工业企业创造的价值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为居民收入增加和脱贫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扶贫的直接成绩看，改革开放前无法与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减贫相比，但也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发展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的减贫基础，才使得改革开放后有了成效显著的减贫工作。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是减贫的第一动力，而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源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二）工业中期阶段的开发式扶贫

从中国扶贫工作看，这一阶段是开发式扶贫阶段，农村工农经营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减贫的核心动力，开发式扶贫与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共同推动了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段内的减贫工作。198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发展商品经济和兴办乡村扶贫经济实体；在具体产业政策上将用先进的技术和物质手段改造传统种养业、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副业、有领导地组织劳务输出等作为重点。可见，无论是对工业产业发展的支持，还是对扶贫经济实体的重视，工业扶贫在此时已成为扶贫工作的重要路径。就工业而言，这一阶段的工业扶贫实现了从间接溢出效应扶贫到直接开发式扶贫的转变，从收入扶贫开始转向生产要素扶贫。乡镇企业和乡村工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农村土地所有权与农业生产利益损失的补偿。首先，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其次，城市工业也将一些不适应在城市发展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转移到了农村。有研究显示，1998年，全国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超过4800万人，其中大多数属于农村劳动力。同时，随着沿海地区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逐步放宽，“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方式逐步发展。到1991年，农民收入当中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了1/5；到1996年，中国乡镇企业职工的收入已经达到4100多元。1992年的调查研究显示，92%的乡镇企业分布在自然村范围内，7%的乡镇企业分布在乡镇范围内，乡镇企业与农村和农民的紧密联系意味着其与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关联较强。就农业而言，体制改革是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但从根本上看，农业发展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显著进步。中国耕地灌溉面积从1952年到1978年增加了2.25倍，而从1978年到2016年仅增加了1.49倍；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52年到1978年增加了500多倍，而从1978年到2016年仅增加了7倍多；化肥使用量从1952年到1978年增加了100多倍，而从1978年到2016年仅增加了5倍多。这种按照倍数比较的方式本身意义不大，却能构成我们理解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索引，农业机械、灌溉与化肥使用等都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基础上的，可见工业对于减贫的作用愈加突出。

1994年，《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国发〔1994〕30号）对扶贫攻坚的基本途径做出明确指示，即要重点发展种养业以及与此相关的加工业和运销业，要发展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劳务输出；在扶贫开发的形式上，国家倡导兴办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扶贫经济实体，对于不具备兴办企业条件的乡村，鼓励其在工业小区和乡镇开展异地试点以发展二三产业，在“老、少、边、穷”地区兴办的企业，国家对其采取征税后返还或是部分返还的措施。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一些城市工业企业直接



参与了对口扶贫工作，具体形式包括兴办摊点、产品扩散、产销联营、招收工人和技术服务等，这一时期民营企业的扶贫行动被称为“光彩事业”。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在集中连片重点贫困地区优先安排大型开发项目。这些项目以交通、水利和资源开发项目为主要代表。同时也是在这个文件中，首次建立了定点帮扶与东西协作扶贫的机制，东西协作扶贫主要以企业扶贫和项目扶贫形式落实帮扶任务。一些研究也表明，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对农村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远超其他产业。2000年以后，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导致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快速上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经济增长效益趋向高位。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农业增长对于减贫的影响是第一位的，1980年至2000年间，农业的减贫效应是第二、三产业的4倍，而第二、三产业的减贫效应也都是通过第一产业产生的。到2000年底，中国贫困人口下降到32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为3.4%。从收入构成情况看，1985年以来，农民收入当中的非农收入部分实现了年均10%以上的增长，到1990年有37%的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这也意味着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减贫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

（三）工业后期阶段的反哺性扶贫

进入21世纪，兴办工业实现脱贫已成为扶贫工作的共识，“无工不富”成为社会发展的流行判断，民族贫困地区对发展工业脱贫尤为看重。进入工业后期阶段，乡镇企业的扶贫功能不仅体现在提供就业岗位让农民获得工资性收入，还体现在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为乡村提供多种形式的公共服务。这也意味着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开始建立，农民开始更多地分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红利。进入以工补农阶段后，农村工业上缴的农村集体资金和国家税收资金大幅提升，集体和国家获得的资金又以项目和资源支持的方式返回农业和农村。传统农业经由工业农业进而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工业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研究表明，2000—2008年，工业产业发展的减贫效应为1.13，即工业产值每增加1%就会使贫困发生率下降1.13%。随着农业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占比的下降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工业替代农业而成为减贫效应最为明显的产业。正如研究者所言，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中国发展的经验离不开对中国工业的描述与分析，而在笔者看来，对中国扶贫工作经验和成效的把握同样也离不开对工业扶贫工作的描述与分析。

200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加值的75%，其中城市工业占54%，乡村工业占46%，农村工业被视为中国崛起的一种基本力量。工业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力量，自然也是推动脱贫的基本力量。2001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对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全新的、系统的安排和部署。在扶贫途径方面，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和引导大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到贫困地区创业兴业，同时采取多种鼓励政策引导资源开发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 and 市场流通型企业参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这为贫困地区工业的发展释放了更加积极的信号。该文件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加强水利、交通、电力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意味着相关工业的服务重点从原有的城镇地区转向了贫困农村地区。这一时期，乡村企业的发展态势有所减弱，但代之而起的是民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兴盛，工业企业解决就业、增加收入和缴纳税收，推动了中国整体贫困问题的解决。

（四）新阶段的工业全面参与式扶贫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明确指出，合理开发贫困地区当地资源，积极做好新兴产业开发，承接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让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东西协作扶贫双方要在产业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积极配合，鼓励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工作，推进集体经济与农民增收。2014年，我国开始实施建档立卡制度，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工作正式开始。此后，减贫的核心动力转变为国家主导的扶贫实践。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发布，文件指出，要发展特色产业助力脱贫，加强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培养，健全脱贫帮扶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三产融合发展；引导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设立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吸引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扶贫开发。同时还指出应注重劳务输出脱贫，引导企业扶贫与职业教育结合，拓展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空间，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在东西协作扶贫方面，强化以企业为载体的扶贫协作，鼓励东西部双方共建产业园区，实施东西部县域间的携手奔小康行动。

国务院扶贫办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东部地区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29亿元，动员社会捐助款物65亿元，销售贫困地区农特产品483亿元。以大连市对口帮扶贵州六盘水市为例，2019年大连市投入财政扶贫资金1.26亿元，引入13个工业产业项目，项目总投资21亿元，带动发展和脱贫的人口超过1.9万人。在社会扶贫方面，这一阶段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对于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的，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和培训补贴，工商联组织开展“万企帮万村”的精准扶贫行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参与帮扶的民营企业有9.99万家，精准帮扶村庄超过11万个，其投入产业资金近820亿元，投入公益资金149.22亿元，安置就业73.66万人，带动和惠及贫困人口超过1400万人。在新阶段的扶贫工作中，中央企业也承担了大量的帮扶任务，其承担了全国246个重点贫困县的定点帮扶任务，2015—2019年，中央企业共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206亿元，有力促进了贫困地区发展与贫困人口增收。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其中重点是农产品加工业和特色手工业，同时鼓励有条件的贫困县创办三产融合产业园，组织国家级龙头企业与贫困县共建扶贫产业基地；在就业扶贫方面，鼓励贫困地区发展生态友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扶贫企业在贫困地区建立扶贫车间实现贫困人口就近就业，推进贫困县农民创业园建设，东部地区要组织企业到西部发展产业，吸纳西部贫困人口就业，同时西部地区也要组织贫困人口到东部地区就业；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短板，加快发展交通、电力、水利和网络扶贫行动。2020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做好定点扶贫县贫困农民工就业帮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中央企业尽快做好贫困农民工的就业招聘工作。以企业为主体的工业扶贫，当然也能够为工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利益，但在扶贫行动成为国家层面的政治行动与道义行动时，企业也同样需要以积极行动响应国家的倡导。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农民可支配收入当中的工资性收入稳定在40%左右。对于贫困人口而言，工资性收入的占比则更高，笔者调查过的10多个贫困县，贫困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在60%左右。新阶段的扶贫工作使得农村发展水平在全国、区域和省级层面都有明显提升，其中社会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升幅度最大。这一阶段，在国家整体扶贫方式不断创新背景下，工业扶贫也出现了新路径，比如扶贫车间与村镇工厂成了实现贫困人口转移就业的重要载体。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全国共建立扶贫车间32688个，吸纳



就业的贫困劳动力超过 43.7 万人，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41 万多人，创办领办各类经营主体 21.4 万个。2012 年以来，脱贫攻坚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这也意味着扶贫成了中国治国理政的最新实践表达。该时期的工业发展有自身的诉求与内在逻辑，但也需要满足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工业扶贫在产生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了乡村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在客观上实现了扶贫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三、城乡关系变革中的工业扶贫：启示与反思

1949 年以来的工业扶贫历程表明，工业扶贫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扶贫与城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扶贫工作的基本动力，扶贫工作中工业可以实现自身价值诉求与社会效益相结合。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以及中国扶贫工作的阶段性变化，工业扶贫的形式和途径也更加多元，扶贫成效更加突出。工业扶贫是资本反哺农业农村发展的鲜活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的重要特色。工业扶贫带给我们的思考，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工业扶贫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与内涵是与工业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在新中国工业发展初期阶段，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此工业扶贫主要是一种广义上的扶贫，一种间接意义上的扶贫。这一阶段，减贫的主要动力来自农业，工业发展的有限成果向农业领域转移以及服务农业发展的工业品消费是工业化早期阶段工业扶贫的主要特征。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工业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工业扶贫不仅体现在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体现在通过向国家和集体缴纳税费的方式实现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最新阶段，工业自身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西部贫困地区承接了大量来自城市工业领域的产业转移项目，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开发型产业，再次吸纳了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在配合农村“三变”改革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获得了发展，农民也获得了相应的资产收益。在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大量企业直接参与了精准扶贫工作，无论是定点扶贫、社会扶贫还是东西协作扶贫，工业企业不仅面向贫困人口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还向贫困地区提供了大量产业项目并共建了产业园区，这是新时期工业全面参与扶贫工作的具体体现。

第二，工业扶贫的不同形式与中国扶贫工作的阶段性战略是紧密联系的。从中国减贫的历程看，在不同时期中国遵循着不同的扶贫工作理念，其大致经历了广义扶贫、体制改革扶贫、开发式扶贫与精准扶贫等阶段。在不同阶段，国家对于扶贫工作的主导思想与核心路径有着不同的考虑，而工业扶贫工作在不同阶段的内涵、特征及其路径也是与全国扶贫工作紧密结合的。广义扶贫阶段，国家并没有专门的扶贫工作机制和扶贫工作规划，工业主要通过溢出效应实现扶贫。体制改革扶贫阶段，通过城市、农村体制改革的启动，乡村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从工业自身需求和农村发展的实际出发，工业扶贫通过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方式实现了贫困人口的显著增收。开发式扶贫阶段，工业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通过参与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以及继续吸纳贫困人口就业，不仅推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使得工资性收入成了农民收入中的最大构成部分，在倡导工业反哺农业的背景下，工业还参与了农村社区建设与福利供给等，这也为扶贫提供了社会动力和保障支撑。精准扶贫阶段，扶贫成为社会各界倾力协作的政治与社会行动，工业扶贫则从更多的维度介入扶贫工作，不仅在制度层面上构建了更加系统的定点扶贫、社会扶贫与协作扶贫机制，还参与了贫困地区产业项目引进、产业园区



建设、贫困劳动力培训和转移就业等工作，工业扶贫的成效进一步彰显。

第三，工业扶贫嵌入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的变革进程。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来，我国的工农关系经历了从重工轻农到工农并重的变革，同时城乡关系也经历了从分割到融合的变革。优先工业发展阶段，工业经济注重自身的发展、积累与创新是客观形势所需；注重工农平衡与互补发展阶段，工业则有了更多可以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空间与经济资源；城乡分割发展阶段，城市工业与农村间的资源交换与经济支持往往是非均衡性的，且这种交换与经济交往也是不充分的，工业扶贫的成效自然不显著；城乡统筹发展以及融合发展新阶段，工业发展不仅需要农村市场、资源与发展空间，也需要通过向乡村回馈发展资源、机会和利益来兑现自身发展进程中遗留的历史承诺，其不仅为贫困劳动力转移提供岗位，还为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与工业建设等提供了诸多直接帮扶，减贫效应更加显著。

四、新阶段工业扶贫工作的展望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构建

讲好中国减贫故事需要把握好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主线，中国减贫是一个历史性和内在逻辑性相统一的过程。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理解与把握。减贫过程是一个融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减贫的重要条件，但工业扶贫的使命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新的阶段和起点，共同富裕仍是我们需要长期坚持的经济社会发展主题。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的扶贫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发展提供了减贫的初始动力和机制，但仅仅依靠农业实现脱贫是不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力，更是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尽管工业和城市的繁荣发展无法替代农业和农村在中国国情当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就共同富裕而言，工业扶贫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扶贫不仅展现了工农关系的变迁，也回应了城乡关系调整的新要求。在强调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工业扶贫不仅在客观上需要广大乡村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的迸发，更需要乡村为中国工业实现超越式发展提供战略腾挪空间。工业扶贫的持续推进不仅是落实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关键抓手，也是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动力，但依托特定区域的工业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效果十分有限，工业只有实现与帮扶地区更紧密的关联，形成直接溢出效应才能更好地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在分配环节解决好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而工业扶贫则可以为这些工作提供强大推动力并持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业发展思想。收入分配是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着眼点，在既有的产业效益与格局中，工业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具有关键影响。在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区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推动居民消费的扩大和升级，进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从全面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社会的飞跃，要积极探索高质量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道路，构建城乡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新局面，缩小不同群体和区域的收入差距。

在中国工业化的最新阶段，乡村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这不仅源于扶贫工作要求的产业下乡，也源于中国城市工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带来的产能转移和中国工业再发展的空间扩展。土地制度是乡村工业化与中国工业空间拓展的重



要基础，因此新阶段的工业扶贫需要继续发挥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开发权优势，为工业发展提供高水平的保障服务，激发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潜能。2020年后，在扶贫领域，我们将围绕相对贫困持续性地推进扶贫工作，这一阶段既要巩固脱贫成果，还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其难度不言而喻，因此工业扶贫仍将肩负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产业兴旺，而这个产业也不会局限于农业产业领域，在工业的参与下才能更好地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以工业布局与类型调整缩小不同群体间的财产差距。针对2020年后的工业扶贫工作，笔者建议可以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工业扶贫要重视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优势。在人口红利不断缩减、中国工业发展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弱化的背景下，广大中西部地区仍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与工业转型空间。通过工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转移，在贯彻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背景下，中国工业仍拥有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阶段的工业扶贫不仅是益贫式经济发展的要求，更是工业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在回应人民需求的基础上，中国工业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结合产业兴旺与相对贫困治理，工业扶贫有选择地到中西部贫困地区进行再发展，不仅会带来显著的扶贫效益，也将为中国工业自身带来新的增长点。此外，在关注大型企业的扶贫工作的同时，也应更多关注小微企业的扶贫功能，对其提供社会资源支持，以创业推进减贫，而这个过程也实现了国家治理与共同富裕目标的统一。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可以扩展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从这个意义上看，工业在西部地区的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新型工业在乡村的发展也将带来农村人口财产收入的增加，进而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工业扶贫应在城乡融合发展中进行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城乡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与发展方略，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农村消费市场的建设、农村各类资源市场价值的显现以及城乡双向的人、财、物的流动都会更加明显。在这个融合与流动的过程中，农村成为工业品消费的重要场所的同时，也将成为城市消费品的高端生产基地，甚至是高端社会服务的供给基地。因此，新时期的工业扶贫不仅要注重统筹工业行业资源，也需要统筹乡村社会的自然、生态、文化与社会资源，注重与农民、农村建立更加多元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而在扶贫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脱贫。通过企业嵌入地区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技能提升与收入增长等，进而实现中国工业从大到强的全面转型。工业扶贫的创新有助于城乡融合发展，亦可有效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底线任务的完成。同时，新业态产业的政策应更具普惠性和包容性，并向乡村倾斜，这样才能够让工业、企业扶贫发挥更大效用。

工业扶贫应在推动农业转型发展中提供更多扶贫力量。新时期的工业扶贫将跳出工业行业与思维理解扶贫，未来，工业与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从农业的角度看，工业的发展可以助力农业现代化、农业绿色化与有机化。在这个过程中，智能机械、大数据、信息与化学等工业成果被广泛应用，不仅可以突破农业增量不增收的困境，也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在工业的帮扶下，农业产业能够改变自身较为弱势的经济与市场地位，广大农民和乡村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也将得到改变。未来较长时间内，在农村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和生产的情况下，依托工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并实现减贫是工业扶贫的重



要路径。此外，随着农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未来乡村地区将成为提供康养、研学、休闲和文艺创作等社会服务的重要空间。在此过程中，工业需在信息化、物流、智能医疗、远程协同办公和农业生产智能装备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进而助推乡村新服务业态的发展，最终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倍增扶贫成效。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邢成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石宝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吴雨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Top](#)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